



MI 书系

国际货币研究系列丛书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tudies

日元的失败，英镑的衰落，欧元的崛起，美元的问鼎……
大国货币霸权兴衰的背后，潜藏着怎样的文化因素和内在联系？



大国货币

文化篇

涂永红◎著



科学出版社

大国货币

文化篇

涂水红◎著

II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货币Ⅲ：文化篇 / 涂永红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6
(国际货币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7-03-041277-5

I. ①大… II. ①涂… III. ①国际货币制度—研究 IV. ①F8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0836 号

责任编辑：刘英红 张晓雪

责任印制：阎磊 / 封面设计：零创意文化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7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2 1/4

字数：326 000

定价：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序一

如果从 1566 年欧洲爆发的尼德兰革命开始算起，资本主义面世已经超过了 400 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资本主义历经坎坷，先后走过了重商主义、自由经济和帝国主义几个阶段。时至今日，资本主义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广泛、最重要的社会形态之一。尽管有些学者还羞于承认，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资本打造的商品经济几乎承载了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基础。我们也注意到，当下的资本主义世界悄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球化时代，它超越了传统定义下国家的限制，正在以政治联盟为基础、以国际经济分工为手段，对整个世界进行重新布局，意图将全世界纳入到适宜资本运行的统一规则之下，以便让资本主义理念深入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全球范围内高歌畅行。这种改变必须高度关注，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未来，为此我们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部分来检视资本主义的过去和现在，尽力找寻其中隐含的发展节律，以期对中国的未来做出正确的推断和预测。

一、资本主义缘何兴起

回望历史，当时针指向 18 世纪中叶，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最终点燃了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火炬，从此人类社会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机械文明。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倍感振奋的时刻，欧洲大陆上陡然出现了一群燃烧着火焰、喷吐着黑烟的钢铁怪物，巨大的机械很快取代了传统的人力和畜力劳

作，在一片铿锵声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有统计数字表明，从 1800 年到 1825 年间，英国的新型蒸汽机数量猛增了 50 倍，达到 15 000 台左右，总功率超过 375 000 马力，动力革命为资本主义制造业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它使得人类摆脱了自然力的限制，能够以极高的效率创造财富。其后短短的 160 年间，欧洲 16 个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总量增加了 60 倍，人口增长了 4 倍，人均产值增加了 13 倍，而一个劳动力的平均年工时却从 3000 小时减至 1700 小时，劳动生产率提高大约 20 倍。工业革命成倍提高劳动效率，极大地促进了物质生产，这不仅使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足，同时也激发了人类的贪婪本性，产生了以攫取利润为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商品经济。然而这还不是工业革命的全部成就，机械时代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还加快了人们探索世界的脚步。在蒸汽船发明以前，依靠木船风帆从欧洲到美洲至少需要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上航行 2~3 个月，不仅花费昂贵而且周期漫长。1819 年美国蒸汽船“萨凡纳”号横渡大西洋成功抵达英国的利物浦港，整个航程仅仅用了不到 20 天。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世界从此变小了。那些曾经在地理大发现中出现的遥远国度如今无不近在眼前，这就仿佛吹响了淘金的号角，贪婪成性的资本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它立刻起身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把资本主义的理念和生产方式播撒向整个星球。声势浩大的经济全球化就此拉开大幕，开启了资本占领和吞吃世界的过程。

正如马克思所言，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生产力水平成为改变人类世界的关键。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并非生产力本身，而是更高级的文化因素，它依赖于人类对自然认知水平的发展。换句话说，工业文明的到来需要自然科学的大发展和鼎力支持。从历史的角度看，欧洲工业革命的出现既是必然也是偶然。说其必然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是绝对的，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和积累之中，变革的时刻迟早都会到来；说其偶然是指，1533 年

1月英王亨利八世改变婚姻的企图受到天主教会的阻挠，为此他毅然断绝了和罗马教廷的联系。亨利八世此举使得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主持下的新教能在英国立足生根。与天主教控制下的旧大陆截然不同，新教的宽容态度不仅使得文艺复兴的火种能在英伦大地上蔓延成势，而且还从北欧地区吸引了大批因尼德兰革命而遭受宗教迫害的手工业者，进一步壮大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力量。时势造英雄，到了17世纪中叶，伦敦已经成为欧洲现代科学人才荟萃的中心。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催生了大量的自由思想，并借此发展出了诸多学科，形成对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的全新认知。如弗朗西斯·培根的经验主义哲学、牛顿的经典力学、法拉第的电磁场理论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等一大批杰出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精英，纷纷在英格兰潮湿的土地上绽放出自己绚丽的花朵。与旧大陆那边的自然科学探索者布鲁诺和哥白尼的悲惨命运不同，这些生活在英国的求知者受到了来自新教和英国王室的优待和庇护。1662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提出，科学家应该把兴趣集中用于广泛的经济活动领域。这使得新兴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在英国蓬勃发展，而自然科学发展的丰硕成果又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创造了必备条件，也为新兴的资本主义时代奠定了深厚的知识基础，人类历史拉开新一幕的号角就这样吹响了。

二、势不可挡的经济全球化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资本主义自问世以来，以其特有的高效率生产方式迅速征服了整个世界。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经济已经遍及全球，它跨越了不同地区和文化的限制，已成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模式。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一直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打造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及产业模式，这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原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就是超越了帝国主义的更高级的资本主义形式——全球资

本主义，即一种没有国界限制的帝国主义。在这种趋势下，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体是新型的跨国公司而非传统的垄断企业，这种跨国公司基本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它的股权高度国际化，是由一条完整的生产链所衔接的，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独立生产单位构成的集合体，形成了所谓的“无国界经济体”。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注册的跨国公司就超过6万家，其附属企业大约30万家，控制了世界生产总值的40%、国际贸易的50%以及技术贸易的60%，专利技术和直接投资的80%也被跨国公司控制。这些跨国公司的运作以世界为舞台，开发、生产、经营与市场调配无不放眼全球。根据投入-产出比较优势，跨国公司通过资本运作，将人力、生产、技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布局和优化配置，跨国公司内部各子公司的经营目标则完全服务于母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各子公司之间的交易往往依据内部规则完成，体现了市场和资源两方面的分工协作。这种纽带式的内部关系极大地增强了处于不同国家中的子公司间相互联系，彰显了跨国公司生产的整体性和经营的全球性。此外，跨国公司通过选择和构建子公司，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相关的企业文化直接移植到世界任何需要的地方，这种强制趋同的经营方式无疑带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进步，加速了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但是，跨国公司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那就是完全自由的经济运作环境。任何经济或贸易上的壁垒、法律的不健全和政治上的不协调，都会阻碍跨国公司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是国家的对外开放，在经济、政治和法律等诸多方面不对外资设置障碍。

三、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一个国家想要发展，想要不被国际社会边缘化，就必须加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只有如此，该国才能搭乘国际经济发展的快车，不至于被时代所抛弃。然而对这些踊跃加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国

家而言，它们面对的却是一柄双刃剑。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跨国公司主导的新一轮的国际分工，是在这种分工基础上实现广泛的开放与合作。它一方面拉近了国家间的距离，便于经济往来和运行，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国家的独立性，使政府控制国家的能力受到限制，增大了破坏政权稳定的风险。简而言之，开放的国门固然有利于资本的自由往来，方便了企业的经济活动。与此同时，资本不受监管的自由流动也使市场脱离了政府的控制，使政府逐渐丧失对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掌控能力，从而危及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此等后果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乐见的。不仅如此，从更为宽广的视野看，经济活动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侧面，外来的经济必然会带来外来的文化，与本土文化发生碰撞。其中一些不相容的部分就会导致文化冲突，甚至引起颠覆性的后果。置换、摧毁他国文化，这也许就是某些国家政府积极倡导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别有用心。已有种种迹象表明，一些西方大国正在试图利用国际经济一体化开辟的管道，以经济发展为手段和切入口，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文化价值灌输给其他国家，动摇和颠覆不同政体的政权，以达到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目的。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一个国家的发展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被跨国公司接管和控制的时候，这种威胁就迫在眉睫了。

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政权存在的保障。按照以往的观念，国家安全通常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换言之，一个安全的国家是没有内忧外患的。所谓外患，是指国土安全，即国家不受外来势力的威胁，特别是军事侵略的威胁。所谓内忧，是指国内政治、经济不发生重大社会动荡，政权统治稳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强化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通常是发展军事力量，以抗拒外来威胁。然而，物换星移，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由于存在经济的紧密合作与自由流通，经济活动已经没有国界可言，这些不设防的缺口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在势力能

够利用经济交往打开的缺口，把一个国家的外患巧妙地、变本加厉地转化为内忧，进而从内部搞垮一个国家的政权。对此，一国纵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无能为力。当初，西方势力颠覆前苏联的成功运作就是这样的典型范式。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是交织在一起的，经济安全已经上升到了与国土安全等同的地位。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必须将经济安全放在核心位置。保障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未雨绸缪、主动布局，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抢占有利位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与对手等同的手段来反制对方。

四、国际货币是大国的利器

当前的国际秩序总体上看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大国的，因为当初的游戏规则出自这些大国之手。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变局中参与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就能够从战略层面获得主动。当然，想要获得这样的规则制定权，首先需要有资格跻身大国行列。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讲的大国不是指幅员辽阔或者人口众多，而是指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国家。现实中，能够有资格成为大国者，寥寥无几。有一些国家，如日本，曾绞尽脑汁、试图跻身大国却百般不得要领。因为他们始终不懂，大国应该是综合实力的体现，特别是文化方面应该具有引领世界的能力。那些在某个方面具有突出能力或一技之长的国家，充其量只能算作强国，比如日本无疑是经济强国，俄罗斯则是军事强国。按照这一标准划分，历史上获得成功的大国只有英美两家，失败的有前苏联和德意志第三帝国。大国的权威，不仅来自他们的军事力量、经济地位，还来自于他们的文化先进性和政治制度的普适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丈量全球经济成果、便利各国经济往来的手段——国际货币。国际货币是大国的利器，使之能攻善守，在捍卫自身利益时挥洒自如，凭空增添了几分胜算。

以美国为例，二战结束后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已经一蹶不振，美国不仅

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且还成为当时世界上仅存的军事强国，军事实力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发了战争财的美国还借布雷顿森林体系顺势从英国人手里夺取了经济霸主的地位，使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1965年法国的戴高乐先生曾公开揭露这种行为说：“美国享受着美元所创造的超级特权和不流眼泪的赤字。它用一钱不值的废纸去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正是美元的国际化，使得美国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获得的好处不计其数，奠定了美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超级繁荣，经济和军事的强盛也将美国文化推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胜利让美国人自我膨胀，以至于当时的美国教育理事会公然宣称：美国的文化思想和文化观念，包括他的所有缺点和弱点，都将成为战后秩序的基础。

2014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70周年，在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近70年过程中，美元、可口可乐、好莱坞和尼米兹级航母的身影遍及全球，成为美国无处不在的烙印。无论是用互联网打造的虚拟世界还是现实中的军事干涉与经济制裁，美国都在努力运用各种手段谋求国家利益，把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推向全球，希望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固若金汤。然而，历史的车轮有自身的轨迹，不以某个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经济全球化大大拆除了国家人为设置的障碍，资本不分国籍、信仰和肤色，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将大国与小国一股脑地捆绑在一辆战车上，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一路向前，发展赋予了许多国家不曾有的话语权。世界是平的，多中心、多元化的，一个新的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悄然形成，美元的霸权地位因此受到了多方挑战。21世纪伊始，欧洲国家创生了一种超主权国家货币——欧元，不仅在经济上使用欧元进行本地区的国际收支，而且在政治上抱团取暖，试图在国际舞台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发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欧洲声音”。2008年华尔街引爆了祸害全球的金融海啸后，美国的文化、政治制度优势受到普遍质疑，美元的超级国际货币地位更是被公认为是制造这场危机的元凶之一，要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高涨，改革的焦点集中在废除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一票否决权”、增添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2008年年末，基于维护国际金融安全，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目的，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跨境使用，将人民币打造成国际货币的工作悄然兴起。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强大只是大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没有在全球领先的经济总量和份额，一国的货币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然而，一国能否拥有国际货币这一利器，奥秘在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政治、军事和文化是通往大国之路并打造国际货币不可或缺的推手。得之，则事半功倍，如虎添翼；失之，则功亏一篑，美梦难圆。认真盘点国际货币争夺战，分析各大国在打造货币利器进程中的成功与失败，温故而知新，才有可能找准中国崛起、人民币国际化的康庄大道，才有可能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把握自身命运，不至坠入任人宰割的境地。

承列

2014年4月22日

序二

自前苏联解体后，世界基本摆脱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对峙的局面，但期盼中的和平并未如期降临，各种矛盾和冲突依旧充斥在我们的周围。1993年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其作者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塞缪尔·亨廷顿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亨廷顿先生将新世界的矛盾归因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他在自己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证和提出了文明冲突的世界范式，并声称这就是当下一切问题的根源。我们姑且不论亨廷顿先生的说法是否完整和正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明和文化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表征，而且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之本。换句话说，一切人类社会的问题都可以在文化和文明中找到根由和答案。

从逻辑关系上说经济是文化的子概念，它属于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分部。然而，在现实中人们更愿意把经济活动挑出来当成一个独立运转的系统对待，以便研究经济活动特有的规律和潜在的能量。遗憾的是，过分的专注反而忽视了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从属关系。这种思考方式很容易让我们迷失在经济现象的漩涡中，被各种抽象的公式与模型牵着鼻子走，最终成为众多数字的奴隶。按照流行的观点，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行。然而，无论经济怎么重要，它毕竟只是基础，它仅仅是现在、是当下，它无法回答未来、明天会怎样？我们需要另寻答案。事实上，文化以其更为广博的胸襟一直走在经济发展的前面，它扮演着探索者和

传播者的角色，承担了人类认知世界的重任，是我们航向未来的风帆和舵手。换一个角度说，当温饱问题不再威胁多数人的时候，找寻一种更超脱、更理想的社会模式就成为人类共同追寻的目标。此刻，处于底层的经济活动只是人们放飞理想的物质保障，经济发展必然会更多地服务于文化发展的要求，不再囿于经济学偏好的狭隘范畴。由此可见，一旦我们把一些经济问题放到文化环境中去研究，就会撇开蒙尘，发现其终极目的所在。

以货币国际化为例，这一问题通常被纳入经济学的范畴进行讨论，很多专家学者都习惯成自然地认定，既然关乎货币那就一定是个经济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货币固然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也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货币的国际化却不完全是经济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这一点从日元国际化苦苦挣扎的历程中就可窥见一斑。日元几次向国际化的目标冲刺都以失败告终，无论是凭借军事侵略还是经济领先，日元的国际化都没能梦想成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日元第二次冲击国际化的失败更令人费解，为什么一个看似纯经济的问题却由不得经济本身决定呢？以当时的经济实力来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不仅坐拥海量财富，而且日本制造的商品遍及世界，一个经济帝国的强大身影呼之欲出。在这样的形势下，日元国际化似乎毫无悬念和障碍。然而事与愿违，日元国际化最终功亏一篑。虽然有人指证这一切是美国人在国际金融领域作祟的结果，但日元国际化失利的原因绝非如此简单。答案显然不是用算盘能计算出来的，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这一现象，显得苍白和无能为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本书试图将货币国际化这个经济问题回归到文化系统中进行深入研究，摆脱经济学本身的局限和困扰，在更为广阔的范畴中去挖掘文化与货币国际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这个问题的根由，把握其发展规律，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文化支撑。

当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野扩大的时候，历史就会告诉我们，货币国际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它所体现的是文化、军事和政治的合力，是

一个国家成为世界大国的表征。这正是本书的立论基础，也是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视角。一旦我们脱离经济学的窠臼，不再企图用抽象的公式和模型来梳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问题的答案就会跃然眼前。纵观世界历史，能够充当国际货币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货币，如当初的英镑和现今的美元和欧元，这些国际货币的背后的确是强大的经济体。傲视他国的经济实力毫无疑问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是充分条件。历史上经济飞黄腾达的国家远不止英国和美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经拥有过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日不落帝国”这个称号曾经属于西班牙，发达的海上贸易和广袤的殖民地也一度是荷兰人的骄傲，但无论是西班牙的比塞塔还是荷兰的荷兰盾都没能荣登国际货币的宝座，机会却被英镑抓住了。

英镑是怎么做到的呢？多数人的答案是英国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会首先出现在英国而非经济基础更好的欧洲大陆国家呢？与旧大陆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英国这个岛国到底有哪些特别的地方，使得它能得天独厚地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位霸主？答案可能不计其数，然而，仅从一个看似简单的文化现象就足以说明问题。众所周知，英语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据统计有近4亿人的第一语言是英语，还有同等数量的人使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超过80%的电子信息使用的是英语。如此高的语言国际化水平揭示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英语和它承载的文化是英国成功的来源，也是使英镑成为国际货币的深层推手。

马克斯·韦伯先生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英镑之所以成功的奥秘。韦伯先生发现，作为文化现象的宗教是决定资本主义兴衰的关键因素，因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韦伯先生的发现与我们通常认为的资本主义是以生产

力发展为先机的看法大相径庭，资本主义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其实，生产力的发展源自实践，而实践是以理论为先导的人类活动，理论又是文化的产物。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如果没有文化进步作为先导，妄论经济发展只能是井底观天，不得其要。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领军人，主要契机是新教在英国的立足和发展。宽松和仁慈的新教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萌生提供了自由思想和生长空间，从而催生了大规模资本主义的到来。

英镑成为第一个国际货币的另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哲学，这个被“宇宙之王”斯蒂芬·威廉·霍金认为已经僵死而毫无用处的学问。历史上，古希腊哲学一直处于知识的顶端，是人们认识和解释自然世界的知识源泉，直到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使得人们能够借助科学实验，超越哲学模糊的说辞，用越来越清晰的眼光看待世界。这一辉煌成就黯淡了哲学原有的光辉，并使哲学淡出了多数人的视野。然而，人们容易忽略的却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本身就是哲学导引的结果，而且这一结果还直接引发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推进资本主义。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崛起。经验主义哲学在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不再低头臣服于自然，而是赫然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用主宰者的眼光审视自然，研究自然和利用自然。有了哲学的指导，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发展速度一日千里，进而成为引爆工业革命乃至资本主义的导火索。

同样，美元问鼎国际货币体系霸主，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美国拥有无与伦比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实质上这是实用主义哲学打造出来的美国文化的胜利。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突破了传统文化的束缚，把自由平等思想、个人主义、行动与成功紧密关联起来，用极其通俗易懂的美国梦号召民众，树立起资本主义重实效的发展理念，使美国经济快速崛起，并以极高的效率超越了英国与欧洲。如今，侵蚀传统家庭生活的美式快餐，宣扬个人成功的好莱坞电影，伴随着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可口可乐，在全世界为美国文化的到来修桥

铺路，当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美国文化、美国生活时，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就固若金汤了。

当然，欧元、日元、卢布这些区域化货币的背后也有各自不同的文化推手。历史经验表明，文化竞争力差异，以及文化中固有的与经济国际化的冲突因素，是造成日元、卢布国际化进程受挫的主要原因。

把货币国际化问题放到文化大背景中去考量，拓宽了我们思考问题的传统思维边界，是一个创新的视角。本书以主要国际货币为线索，探索文化、宗教在其横空出世、成长、衰落过程中的作用，以史为鉴，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我们对货币国际化问题的认识。弘扬中华文化，抵御外来文化对我国文化内核的侵蚀，在世界文化版图中占据有利的位置，不仅是人民币国际化长久、根本的动力，还是中国引领世界、告诉世界未来是什么的充分必要条件。

泱泱大国，和而不同。

涂永红

2014年4月5日

目 录

序一 i

序二 ix

第一章 文化版图与货币霸权 1

为什么好莱坞大片里的恐怖分子往往以中东人的面目出现？为什么风靡一时的“红色警戒”要将前苏联设定为邪恶力量？为什么肯德基能够打败传统中式风味在中华大地独占鳌头？“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是谁定义了小资生活格调？西服、iPad、留学，多少舶来品构成了生活中的不可或缺？或许西方经济学家宣扬其为亚当·斯密式“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但是他们忽略了这背后悄悄改变着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格局下源源不断涌入的美元。

文化的界定 /3

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 /9

货币国际化的文化真相 /21

第二章 货币：文明记忆的承载者 33

先民的鲜血和汗水浇筑了货币。东方富庶而统一，财政货币的剥削偶尔触发王朝循环，除此之外，货币和信用从未发挥过对经济应有的刺激职能。相反，西方自然经济业态的贫瘠和持久的动荡，为多元文明腾挪出难得的空间，使得商业、信用从无力求得自我资金平衡的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在非洲黑奴、美洲白银和欧洲的机器之上创造出令人生畏的近代文明。

轴心时代的文明曙光 /34

东方独秀中世纪 /42